

## 郁達夫自我放逐南洋的神話

—— 浪漫文人／抗日英雄／商人／烈士 ？

◎ 夏 菁

### 一 自我放逐南洋炎荒的抉擇

#### （一）自我放逐的含義

從歷史事件來看，放逐(exile)應該包含兩種形式，即流放和流亡。前者是一種被動的狀態，因為政治的原因而受到驅逐貶放到蠻荒邊遠地區的懲罰。後者則是一種主動的姿態，自動撤離中心地帶，從凡俗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獲得身心的自由狀態。這種放逐不一定要離開家園和土地，主要特徵是精神上的放逐，在一種隱喻的放逐環境中，把自己與某種文化的特權、榮譽、關係疏遠，成為身在其中的局外人。薩依德(Edward. W Said)認為知識份子的流亡接近這種形式，在《知識份子論》<sup>1</sup>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中，他對知識份子的特徵作了較詳細的描述。在薩依德看來，知識份子天性就是放逐者，是走向邊緣的人，「知識份子的主要責任就是從壓力中尋找相當的獨立」<sup>2</sup>。因為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份子從權力中心疏離出來，成為自在安適的邊緣的人，所以，處在邊緣的人就像旅行家、探險家，具有好奇和發現新事物的精神，他們「對任何事情都不視為理所當然」<sup>3</sup>。但這並不意味著放逐的人與先前的經驗、知識完全割斷，而是處於兩者之間的狀態(state of in-betweenness)。這種「之間」的狀態使放逐者在看問題時具有「雙重視野」(double perspective)，即「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情況這兩種方式看待事情」<sup>4</sup>。因為放逐者把自己邊緣化(marginal)，不接受習慣文化的馴服(undomesticated)，所以在思考問題時就如同旅人，很容易對事物作出反應，並以不可預料的、創新的眼光對事物進行解讀。

總之，簡要地說，所謂自我放逐，就是人們（通常是指知識份子）主動把自己從尋常的、習慣的生活中解放出來，成為邊緣人。

#### （二）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

我之所以要對郁達夫的自我放逐作特別界定，是因為上述的描述不能完全準確說明郁達夫的放逐特徵，郁達夫的放逐是有其獨特性，獨特在於其文化、其個人氣質。郁達夫經歷了新舊社會的轉型期，因而具有傳統與現代文化的雙重特點。在傳統方面，他像舊式文人：多愁善

感，懷才不遇，喜怒無常，飲酒嫖妓追求名士風範；另一方面，他又是個現代知識份子：張揚個性，珍視自由，看重孤獨。郁達夫身上的新舊特點，使他在入世與出世、社會與個人之間不能做到幹練灑脫，而似小女人之態。在我看來，郁達夫的自我放逐，不似安適、自在，而似傷感、頹廢。頹廢像一個擋劍牌，是在他被社會放逐後使出的招數，正如郭沫若所說的：「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sup>5</sup>雖然很多批評者認為郁達夫頹廢感傷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響，但我認它主要是中國舊文人式的，西方的浪漫思潮只是給郁達夫宣洩這種情緒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以他的〈零餘者〉為例作簡要說明，〈零餘者〉實際上是馬志遠的「天淨紗」的擴寫，「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些意象在〈零餘者〉中清晰可見，而所謂「零餘人」就是那個仕途失意的「斷腸人」，因為其才不為社會所用、理想不能實現而感傷悲吟。郁達夫的痛苦是現世的，而鮮少對人的生存處境作形而上的哲學思考。我們在郁達夫感傷行旅中，隨處可見他對時政的批評，以及有意和無意流露出的無法施展抱負和理想的痛苦。

事實上，郁達夫的失落痛苦是他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共有的體驗。舊時的文人，讀書就意味著攀向政治仕途，「學而優則仕」、科舉選拔制度使讀書人合法走向社會政治中心，可是，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再也不能憑讀書途徑掌控權力，施展理想抱負。正如李歐梵教授所言，「中國知識份子，有史以來第一次集體感受到與政治社會的疏離 (alienation)」<sup>6</sup>。郁達夫曾在一文中對現代知識份子的「失勢」作了這樣的痛苦的表述<sup>7</sup>：

自去年冬天以來，我的情懷，只是憂鬱的連續。我抱了絕大的希望想到俄國去作勞動者的想頭，也曾有過，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虛無的的觀念，在揚子江邊，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過，但是柔順無智的我女人，勸我終止了。清明節那一天送女人回到了浙江，我想於月明之夜，吃一個醉飽，圖一個痛快的自殺，但是幾個朋友，又互相牽連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現在的心裏，還是苦悶得和半年前一樣。

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勢後的我這零餘者，教我能夠做些甚麼？

「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的想法，可說是困擾了郁達夫一生，也是他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普遍關注的問題。從梁啟超到魯迅等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可說就在一直尋找著如何為國家、為社會「做些事情」，他們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社會價值，很大程度上是在尋找一條影響權力中心的途徑，藉以實現其政治的、社會的理想。

但是，郁達夫畢竟是在新文學空氣中成長起來的現代作家，他的苦悶也具有時代特徵，他筆下的自我形象：反壓抑，反束縛、張個性，就是現代思想的產物。

總之，郁達夫身上的新舊特點，造成了他深刻的精神矛盾，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培育出的文人趣味與現實的矛盾，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矛盾。郁達夫的精神矛盾，使他既不能超然物外做一個隱士，也不能幹練勇敢做個戰士。我認為，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至少包含兩個層次。首先，它是中國舊式文人式的：在仕途失意後走向邊緣，借酒和女人排憂解愁，以忘懷現實；其次，它也極具現代色彩：表現自我、反叛束縛、張揚個性、強調自由、權利以及個體生命的孤獨。因此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不太同於西方式的精神流浪，是在珍重自由中又包含著不能丟棄的社會責任感。

## 二 自我放逐南洋之因

在1938年底，郁達夫懷著遺世炎荒的落漠心情接受了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的邀請，從此踏上了人生遙遙無期的旅程。郁達夫雖然被認為是一個浪漫派的頹廢作家，但在中國抗戰正激烈的時期出走南洋，不僅在當時，就是在後來，人們對他南渡之原因各有猜測：有人認為郁達夫南渡帶有官方使命，到南洋去作海外宣傳<sup>8</sup>；更多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挽救他與王映霞破裂的關係，在陌生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sup>9</sup>；也有人認為郁達夫放逐南洋，是因為國民黨政府的迫害<sup>10</sup>；還有人認為郁達夫到南洋，是因為浪漫詩人的幻想<sup>11</sup>等等。這些說法都無不有根據。確實，郁達夫在南渡前的婚姻狀況、寫作狀態、政治待遇以及其周際關係，都會是他自我放逐南洋的因素，當然南洋在郁達夫心中的印象和幻想也是他南渡原因之一。

### （一）在放逐中癒合家庭

郁達夫在來南洋前的幾年時間，可說是他一生中最沮喪、最感困惑的時期。在婚姻方面，郁達夫要算是一個失敗者。他與原配夫人及王映霞之間的三角關係，則是婚姻痛苦的本質所在。郁達夫在1920年奉母命從日本回家與一個農村姑娘結婚，這段婚姻雖然在婚前缺乏了解和愛情，但婚後，他們也能相濡以沫，過著正常的夫妻生活，可是在1927年初，他在老朋友孫百鋼家邂逅當時杭州美女王映霞，被其美貌打動，並陷入情網，不能自拔。從郁達夫的性情來看，當年追逐王映霞，應是真情所動。郁達夫本是一個浪漫文人，對女人有著真切的喜愛，尤其是美麗的女人。他（《沉淪》中的主人公）曾宣誓<sup>12</sup>：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王映霞那「豐肥的體質和澄美的瞳人」，當然給郁達夫帶來驚艷和振奮，他也確實一度從頹廢中奮發起來，過了幾年「富春江上神仙侶」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長，他受不了日常生活的單調、滯悶，家庭的束縛，一次又一次離家出走。他多變怪異的性格讓王映霞捉摸不定，夫妻生活蒙上陰影。而且，郁達夫雖然與原配離婚，可並未辦理法律手續，前夫人還是住在郁達夫在富陽的老家，郁達夫甚至有時在與王映霞生氣後還回到老家與原配團聚。這當然大大傷害了王的自尊心，使王映霞總覺得郁達夫是把他當小妾看待。郁王對婚姻的不同理解，最終導致二人感情破裂。郁達夫對婚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舊式文人的，他迷戀、追逐王映霞，是以男人愉悅的眼光，而鮮少從人的平等意義的角度去理解她。他不習慣家庭生活，就離家出走，尋找家庭以外的新鮮刺激，但王又是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新女性，與郁達夫的看法和行為當然會發生抵牾與衝突。郁達夫在夫妻關係最緊張時攜妻來新加坡，也許確實有些是為了緩和二人關係的考慮，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在〈毀家詩記〉中他似乎說到南渡的原因：「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所謂「奇羞」，據郁達夫註釋，大概在1937年8、9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他與王不和之機，在一次飯後，王失身於他。郁達夫感到「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於是投奔南洋，「若能終老炎荒，更係本願」。他也寫過這樣沉痛的詩句<sup>13</sup>：

投荒大似屈原遊，  
不是逍遙范蠡舟，  
忍淚報君君莫笑，  
新營生壙在星洲。

當然，在星洲新營生壙，結合當時的歷史情景，會有多種解釋，但希望彌合夫妻感情間隔，破鏡重圓也在情理之中。郁達夫從迷戀、到瘋狂追逐王映霞，最後到自暴「家醜」，可以說只有郁達夫這樣氣質的人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 （二）在放逐中啟動創作力

作為一個作家，郁達夫當然應是以不斷創作立足於世。但是1930年後，「他的作品不像以前那樣暢銷了」<sup>14</sup>。1932年5月，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可發行不到兩月即遭到查封，同年12月，郁達夫將它易名為《饒了她》出版，但當局還是將之查禁。1934年，他開始為林語堂的雜誌《論語》寫稿，隨後開始寫自傳片斷，回憶往事，寫作靈感明顯趨向枯竭。耐人尋味的是，這段時間，郁達夫過著從未有過的安逸生活。1933年，郁達夫決定離開上海，準備在杭州長期住下去，於是在杭州城東建造了一座住所。按郁達夫的原計劃，本來只是打算搭一間簡陋的茅屋，便於他隱居寫作。不料卻建成了一幢十分洋派的建築物，但郁達夫還是將它命名為「風雨茅廬」，可見郁達夫對隱居、自由生活的嚮往。郁達夫也確實在西子湖畔過了一段時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靜生活，卻很少有創作的衝動<sup>15</sup>：

在家吃點精緻的菜，喝點芳醇的酒，睡睡午覺，看看閒書……總之懶得動。而每次喝酒，每次獨坐的時候，只是想著計畫著的，卻是一間潔淨的小小的住宅，和這住宅周圍的點綴與鋪陳。

郁達夫似乎要被閒適的日常生活腐蝕了，他往常愛流浪在外的性格慢慢消退，正如他在〈住所的話〉一文中坦率透露<sup>16</sup>：

從前很喜歡旅行，並且特別喜歡向沒有火車、飛機、輪船等近代化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到了地曠人稀的地方，你可以高歌低唱，袒裼裸裎，把社會上虛偽的禮節，謹嚴的態度，一齊洗去……這一種好遊旅，喜漂泊的性情，近年來漸漸地減了。

郁達夫意識到安逸對創作的殺傷力，他開始尋找新的創作活力。郁達夫1938底南渡，是否意味著他要重新開始漂泊流浪，喚回他漸在枯竭的創作靈感呢？根據姚楠在一篇文章中所言<sup>17</sup>：

他在1938年曾與郭沫若先生定下了復興創造社的計劃，初步打算出一個文藝雜誌。達夫先生希望能在星洲實現，後來果然在1939年6月1日創辦了《星洲文藝》，同《星洲日報半月刊》合在一起……這個刊物請郭老題字，也含有兩人合作復興創造社之意。

但不如所願，除初到新家坡時寫的〈檳城三宿記〉和〈麻六甲遊記〉外，郁達夫的創作大不如前，只是寫些政論、雜文以及舊體詩。

## （三）無奈放逐

郁達夫創作在日落西下的時候，同時在精神上也接連受到打擊，除了小說遭到當局封禁外，由於他個性獨立不依，雖然在1930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但因為他「決不願負擔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而自動辭職。1930年1月16日，「左聯」召開會議，將郁達夫開除，在當日會議六項決議中，第六條就寫著「肅清一切投機和反動分子——並當場開除郁達夫」<sup>18</sup>。對於「左聯」的這個決定，郁達夫表面上似乎不以為然，但他多少會受到打擊。正如郭沫若所說：「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脆弱。」<sup>19</sup>1937年郁達夫遭受到他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機，這就是所謂王映霞「紅杏出牆」之事。儘管這事沒有根據，但郁達夫多疑、善於幻想，彷彿就像真的。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一文中沉痛地說：「我因不聽他（指魯迅——引者注）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sup>20</sup>。這位黨部的先生指的就是國民黨要人許紹棣，當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這件事在郁達夫方面，似乎受到國民黨的壓迫。

郁達夫在1938年前的幾年裏，可說是在各個方面都不太滿意。1936年雖到福建做「官」，但只是一個閒職，而且工資也不能按月領取，工作了兩個月，卻只拿到一百元錢。郁達夫可說是感到前途一片灰暗，正在他似乎也走投無路之際，1938年冬，他收到南洋《星洲日報》的邀請，這無疑給他帶來了生機和希望。

#### （四）南洋之夢

郁達夫最後放逐南洋，除了以上的因素外，南洋在郁達夫心中的印象和幻想可能也是原因之一。郁達夫本是一個富於幻想、浪漫的文人，而南洋在當時一般中國人心中具有神秘的印象：她遍布黃金，許多去南洋的中國人都發大財而衣錦還鄉，這些美麗的傳說在民間影響很大，再加上每逢中國政府或革命團體在南洋募捐，都會得到華僑的積極支援，使遠在國內的人更加嚮往南洋。另外，在文人的作品的中，南洋神秘多彩，風景宜人：像徐志摩的散文〈濃得化不開〉對熱帶光與色的描寫、老舍的小說《小坡的生日》對美麗花園的描寫，都很有藝術感染力。早在1929年，郁達夫就有到南洋各地一遊的念頭。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當時在上海暨南大學唸書，在汪靜之家結識了郁達夫，後來他曾抄了幾首以描寫南洋風光為題材的舊體詩請教郁達夫，詩中的榴鍾、娘惹等字眼吸引了郁達夫，在問明白了意思後，大感興趣地說：「啊！南洋這地，有意思極了，真是有機會非去走走不可。」當時汪靜之卻給他潑冷水說：「像我們這種人老遠跑到南洋去發不了財，實在沒有意思！」郁達夫卻不以為然，並且說：「斯蒂文生的晚年就是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渡過的，他在那裏就寫了不少非常有意義的作品。」雖然郁達夫與汪靜之對話的焦點不在一個層面上，可也透露出郁達夫當時對南洋帶有甚麼樣的印象與幻想了。

郁達夫在隱住杭州期間就曾想入非非地買過獎券，幻想發意外之財<sup>21</sup>，以擺脫家庭經濟困境。他當年到南洋也不能說沒有發財之盼。後來隱居蘇門答臘，自願承當酒店老闆，也許可能說明這點。

### 三 放逐南洋的神話

#### （一）棄絕浪漫的抗日政論

從郁達夫到南洋後所發表的作品來看，他已不能再被稱為一位作家。郁達夫到新加坡一個非常明確的職業是編報人。他主編過《星洲日報》四種副刊：《晨星》、《繁星》、《文藝》和《教育》。此外他還兼編《星檳日報星期日》的《文藝》雙月刊、《星洲十年》，《星洲日報半月刊》的《星洲文藝》欄，以及英國情報部出版的《華僑週報》。由於當時特定的政治氣候，這些刊物幾乎成了宣傳抗戰的陣地，如提高群眾的抗敵意識、激發民眾的抗敵熱情以及提高民眾的政治認識和覺悟等等。

郁達夫因為編報之關係，常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根據姚夢桐仔細的考證，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寫的文章共計462篇，其中政論就佔104篇<sup>22</sup>。內容主要是與抗戰有關的時事評論：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籲民主國家要緊密合作，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戰，強調所有華人團結一致，抗日到底。如〈戰後敵我的文藝比較〉、〈抗戰兩年來的軍事〉、〈抗戰兩年來敵我之經濟與政治〉等文章。這些政論文章雖然帶有明顯的作者性格特徵，即以激情色彩感染讀者，而不求論證周密、嚴謹，但即使是文藝評論，也帶有很濃厚的政論色彩。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強調文學與政治、與大眾的關係<sup>23</sup>：

在政治飛躍的時代，太高的純藝術是趕不上時代的，……以後的文藝，與政治及大眾，更須發生密切的關係才行。文藝假使過於獨善，不與大眾及現實政治發生關係的時候，則象牙之塔，終於會變成古墓。

在〈戰時文藝作品的題材與形式等〉一文中，他也指出文藝須有時代氣息，並提及作品的政治作用：「個人的戀愛，個人的生死，以及個人的感情的起伏，在這一個大時代裏，當然再也喚不起大眾的注意來了。」<sup>24</sup>

寫到這兒，我們看到在郁達夫身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他曾在30年代為了堅持作品表現個人主義而講了這麼一句名言：「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為此還引起一場風波以至後來被「左聯」開除。而此時，他似乎把這句話顛倒過來說：「我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戰士。」郁達夫的轉變是驚人的，也是自然的。在〈悼胞兄曼陀〉一文中，郁達夫曾對胞兄曼陀被日偽殺害一事遲遲不作反應的原因作了這樣的說明<sup>25</sup>：

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裏，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把個人情感屈於民族情感，小我讓位於大我，這是中國歷代進步文人在面對外來入侵時都會作出的自覺選擇，郁達夫埋葬個人小我，高揚民族大我，則正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我在前面說過郁達夫放逐邊緣，零餘感受，是因為他在現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無法施展抱負和理想而作出的無奈招式。而在放逐南洋後，郁達夫埋葬小我的頹廢感傷，揮寫民族「大我」情懷，就在於他找到了自己的社會位置。此時他身負眾望，負責主編文藝副刊，在抗戰宣傳中舉足輕重。幾乎是一到新加坡就為抗戰在海外建立了一座文化中繼站，「把南洋僑眾的文化，和祖國的文化來作一個有計劃的溝通。」<sup>26</sup>他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驚人的。「他每天伏案工作平均十小時以上，每天筆耕平均總在四千以上。除本身寫作和編務，還培育青年作者。」<sup>27</sup>這樣的工作勁頭，真像一個戰士。郁達夫在放逐中發現了自己的位置，在邊緣走向了中心，這就是郁達夫式的自我放逐。

## （二）舊式文人生活

但郁達夫畢竟是郁達夫，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士。在新加坡期間，郁達夫舊習難改，舊派名士作風毫無收斂，「在公眾場合裏碰見女孩子，有時表現出親熱的樣子，有時也跟歌星一起拍照」<sup>28</sup>，毫不顧及。據李向的文章<sup>29</sup>：

郁達夫那時被一批舊式文人包圍著，經常的去喝酒、打牌、玩樂。他本來就是一個風流才子，這種逢場作戲的場合他是安之若素的，於是和紅舞女同坐黃包車招搖過市者有之，和甚麼姐妹花左一個右一個合拍照相者有之，甚至帶著妻子兒子上「公館」（俱樂部），當著他們面前和別人打情罵俏的怪事也做了出來。王映霞私下裏曾對友人說，郁達夫在上海時雖也慣於冶遊，可也沒有像在新加坡時這樣胡鬧的。

王映霞後來在離婚啟事中說「（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的話，雖是怨恨之言，卻也不是沒有根據的。

郁達夫當年在馬六甲引起圍攻，除了雙方看待問題的視角不一樣外，另一個也許是很重要的原因，是新馬文藝者不滿郁達夫的名士氣質。本來他們對郁達夫的頹廢一面早有所聞，而郁達夫在一到馬六甲後就被一批舊式文人包圍住，彼此做些唱和風雅之作，疏遠抗戰文藝工作，當然會加重這不滿的情緒，如張楚現在一文中就十分有針對性地指出<sup>30</sup>：

抗戰要求每一個文化人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因此即使是以頹廢文人著稱的郁達夫先生，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本其熱情和正義感，動員他的筆和口，為民族服務，這便是郁先生到新加坡來雖然聲稱是「慕南洋風光」，而南國文化青年們仍不減其熱誠希冀的原因。

郁達夫的名士作風，就他性格而言是極其自然的。正如後來樓適夷給郁達夫解圍的〈遙寄星洲〉一文中所說的，郁達夫與魯迅、茅盾是不同的類型，不能用希望於魯迅、茅盾的去希望於他。只有承認這點，才能理解郁達夫，才能理解郁達夫的頹廢與其放逐之間的關聯。在郁達夫這裏，頹廢是一種生活形式，是承當脆弱的一種招架，所以郁達夫在自我放逐的途中，往往會有頹廢的表現。

## （三）幾個問題的論爭：邊緣人視角

我們已經知道：處在放逐中的人實際上是把自己從中心邊緣化，但這並不是完全割斷歷史，放逐者在看待問題時常用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情勢一起思考，所以常常帶著二元視角，即不會以單一的立場看事物，每看到新土地上的事物，他自然會聯想舊地方的事物來比較思考，並且這種思考常常可以是新的、不可預料的眼光。因為放逐者的思考狀態是流動的，不會墨守成規。郁達夫在放逐南洋後，在如何看待中國與南洋之間問題上就具有這些特點。

郁達夫到南洋後不久，為在出席檳城的一個歡迎會上回答一些文藝青年的詢問而寫的〈幾個問題〉，在1939年1月21日的《星洲日報》上發表。幾個問題包括：一、南來的文藝界，當提出問題時，大抵都是把國內的問題全盤搬過來，這現象不知如何？二、南洋文藝，應該是南洋文藝，不應該是上海或香港文藝。南洋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應該怎樣使他發揚光大，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三、在南洋做啟蒙運動的問題。四、文藝大眾化，通俗化，以及利用舊形式的問題<sup>31</sup>。

雙方就這幾個問題各表其態而引出一場爭論，最大的分歧在如何看待魯迅以及在南洋文藝的地方色彩。這些問題在今天看來可能都不成為問題，可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許多人只把南洋作為暫住之地，效忠的是中國。因此強調南洋本土化的問題就顯得特別艱難。表現在文學創作方面，新馬作家幾乎把魯迅的寫作模式奉為圭臬，而忽視了本土性的表達。郁達夫認為：「文藝，既是受社會、環境、人種等影響的產物，則文藝作品之中，應該有極強烈的地方色彩，有很明顯的地方投影。」<sup>32</sup>所以，「生長在南洋的僑胞，受過南洋的教育」，所寫的作品當然應具有「南洋的地方色彩」<sup>33</sup>。很明顯，郁達夫是在奉勸南洋文藝青年不要一味模仿魯迅的雜文文風，而失去了個性以及南洋的地方性，因為在他看來，魯迅的文體和風格只能是魯迅的，是屬於魯迅的那個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南洋文學青年不顧其本土性的表達而盲從學習，那只是削足適履。郁達夫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非常客觀的，但在當時要打破已成習慣的社會評判，自然是吃力而不討好之事。當然，郁達夫初來乍到，對南洋歷史還不太熟悉，一時還很難服眾。事實上，正是因為他是「新客」，才有能力提出不同常規的見解。因為郁達夫的邊緣人視角，看問題能越出常規和習慣而發表新奇的見解。也正因為邊緣人視角，與南來其他中國作家相比，他對新馬文壇貢獻是最大的<sup>34</sup>。

#### （四）不只是商人

1942年2月，日軍攻佔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隨後新加坡淪陷。郁達夫和「抗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如胡愈之、王任叔等被迫撤離新加坡，幾經轉折，最後在印尼蘇門答臘省一座叫巴爺公務的小鎮暫住下來。郁達夫開始蓄胡子，寫舊詩，抒發自己對戀人、故鄉的思戀，以及表達抗戰的決心。郁達夫等一行人在巴爺公務，為了隱蔽身份，並解決生活問題，他們經營了一個「趙豫記酒廠」<sup>35</sup>（寄賦復興、討伐仇敵之意）。這家酒廠名義上老闆是郁達夫，此時他化名為趙廉，故酒廠叫「趙豫記酒廠」，但實際的管理人是張楚琨和胡愈之。郁達夫除了寫舊體詩外，還必須給武吉丁憲兵隊當翻譯，但不拿憲兵隊的薪水。他總在尋找機會辭去這份差事，但要擺脫憲兵隊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他們很難找到像郁達夫這樣中文、日文、英文、荷蘭語以及印尼語都懂的人，後來郁達夫想盡辦法弄壞自己的身體，證明得了肺病才得以成功。郁達夫在作翻譯期間，由於職務的關係，保護了許多華僑和印尼人民。

因為有郁達夫與日本憲兵隊周旋，並不斷地送酒、送錢，日本憲兵隊很少來酒廠找麻煩。巴爺公務看起來比較安全，因而許多文化界人士和從事抗日活動的青年，聚集到這個市鎮上來避亂<sup>36</sup>。但要維持眾多人的生活，則顯然不夠。後來，他們想辦法開了肥皂廠和造紙廠，還是由郁達夫當名義上的老闆，但因銷售不景氣，不久關閉。「趙豫記酒廠」也成了抗日人士活動的中心，在郁達夫的掩護下建立秘密組織，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據張楚琨記述<sup>37</sup>：

憑著郁達夫的掩護，我們在日本統治下，建立了一個秘密組織——「同仁社」。領導人是胡愈之，參加者有沈茲九、汪金丁、邵宗漢、王任叔、吳柳斯、張企程、高雲覽和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廬」座談一次，主要是交換報上、收音機裏和耳聞的消息，分析敵人的動態，討論聯軍反攻的可能性和時機……郁達夫沒有參加「同仁社」，我們沒有讓他參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顧他的境遇。參加這樣的地下組織使他不便，成為負擔。但他都看在眼裏。

胡愈之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裏對此也作了記述<sup>38</sup>：

為了政治認識的不相同，所以我們一些朋友在蘇門答臘建立秘密小組，展開華僑抗日宣傳工作，研究印尼問題，都沒有讓達夫參與。達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當作不知道。

郁達夫沒有讓參加「同仁社」，我想，他當時寂寞孤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郁達夫的掩護，「同仁社」能夠順利展開活動嗎？郁達夫這時的痛苦，是他不願為日本人工作卻不得不作，他想為朋友做事而實際上也做了許多事，卻被排斥在外，成為「同仁社」的邊緣人。

#### 四 備受爭議之死

1945年，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許多人對他被害感到吊詭。夏志清評論說：「對一個既非共產黨員又非極其愛國的作家來說，這無疑是個反諷的結局。」<sup>39</sup>一些正直的日本人理解，例如鈴木正夫先生，他在文章中悲痛地說：「郁達夫愛日本和日本人，他對日本和日本人有獨到精深的了解，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在日本人手中慘遭橫死，連遺骸也不知下落。」<sup>40</sup>那麼，與郁達夫在蘇門答臘一起生活過的共產黨人，又怎樣評說郁達夫被殺事件的呢？他們普遍認為郁達夫是可以避免這個悲劇發生，但郁達夫的名士氣質害了他，暴露了自己，最終被日本人殺害。王任叔在〈記郁達夫〉一文中就沉痛而又尖銳地指出<sup>41</sup>：

是的，達夫失蹤了！達夫是永遠失蹤了，我們還得咬緊牙關來說：願中國知識份子中間，永遠不會再有達夫；新時代不需要有這樣人物出現了！作為我們的一面鏡子，我們記住：我們的悲劇是應該收幕了的，早應該收幕了的。我寫下這，我要告訴我們青年一代，達夫已經走完了名士的路，舊名士的路，新名士的路，他都為我們走完了。我們是不應，而且也大可不必再走了。……我們之間，誰還不能洗淨達夫所具有的那一種氣質呢？那麼就得從達夫的路，跳過去了！我們是不必為達夫悲哀的。

王任叔在對郁達夫被害原因的分析中包含的批評，一方面是因為郁達夫做過日本憲兵隊的翻譯，他認為這是一個污點，而他最不滿就是郁達夫身上的那種名士氣質。對郁達夫之死的爭議，其實也透視了人們對他的評價問題。他性格複雜多變，既新又舊；對政治既熱情又疏離，對國家既熱愛又痛恨，人們很難用一把尺子衡量他。這也許就是邊緣人的悲劇命運。

郁達夫的死無疑帶有悲劇色彩，他一生孤獨、寂寞，就是死也是孤獨的，不被理解的。「他愛朋友，而朋友出賣他、誣衊他。他愛同胞，而許多人不理解他。」<sup>42</sup>他一生為想要做點事而苦惱，但一生卻處在社會邊緣。

1952年中國政府追認郁達夫為烈士。郁達夫一生政治生命不得意，對此榮譽，他在九泉之下也許會感慰籍。

#### 註釋

- 1 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
- 2 同註1，頁34。
- 3 同註1，頁97。
- 4 同註1，頁97。

- 5 郭沫若：〈論郁達夫〉，載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香港：三聯書店，1986），頁88。
- 6 李歐梵：《西潮的彼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5），頁39。
- 7 郁達夫：〈寫完《蕩蘿集》的最後一篇〉，載《郁達夫文集》第七卷（香港：三聯書店，1983），頁155。
- 8 秦賢次：《郁達夫抗戰文錄》（台北：洪範書店，1978）。
- 9 同註8；王潤華編：《郁達夫卷》（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
- 10 姚夢桐：《郁達夫旅新生活與作品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出版社，1987）。
- 11 同註9王潤華編：《郁達夫卷》。
- 12 郁達夫：〈沉淪〉，載《郁達夫文集》第一卷，頁24-25。
- 13 郁飛：〈先父郁達夫在星洲的三年〉，載王潤華編：《郁達夫卷》，頁72。
- 14 李歐梵：〈現代中國作家的浪漫主義的一代〉，載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頁557。
- 15 郁達夫：〈住所的話〉，載《郁達夫文集》第四卷，頁23。
- 16 同註15，頁22-23。
- 17 姚楠：〈緬懷郁達夫〉，載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頁496。
- 18 轉引自劉炎生：《郁達夫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頁224。
- 19 同註5，頁86。
- 20 郁達夫：〈回憶魯迅〉，載《郁達夫文集》第四卷，頁223。
- 21 姜德明：〈魯迅與郁達夫〉，載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頁288。
- 22 同註10，頁163。
- 23 郁達夫：〈倫敦《默叩利》志的停刊〉，載《郁達夫文集》第四卷，頁267。
- 24 郁達夫：〈戰時作品的題材與形式等〉，載《郁達夫文集》第七卷，頁54。
- 25 郁達夫：〈悼胞兄曼陀〉，載《郁達夫文集》第四卷，頁322-23。
- 26 郁達夫：〈關於溝通文化的信件——答柯靈先生〉，載《郁達夫文集》第九卷。
- 27 同註13。
- 28 李向：〈郁達夫在新加坡〉，載王潤華編：《郁達夫卷》，頁222。
- 29 同註28。
- 30 張楚琨：《讀了郁達夫先生的〈幾個問題〉以後·編者附言》，見註28，頁231。
- 31 郁達夫：〈幾個問題〉，載《郁達夫文集》第七卷，頁47-51。
- 32 同註31，頁48。
- 33 同註31，頁48-49。
- 34 林萬菁曾對中國南來作家作過研究，他認為郁達夫對新馬文壇的貢獻最大，見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新加坡：萬里書局，1978）。
- 35 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在《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一書對此作了詳細的注釋，見鈴木正夫著，李振聲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102。
- 36 同註35，頁105。

- 37 張楚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載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頁615。
- 38 胡愈之：〈郁達夫在流亡中〉，載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頁562。
- 39 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533.
- 40 同註35，頁248-249。
- 41 王任叔：〈記郁達夫〉。
- 42 同註38，頁564。

夏菁 1967年生，目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小說和晚清及以後的域外遊記。出版專著有《沈從文鄉土小說中神話與寫實的二重變奏》；曾發表論文有〈〈孫武〉的悲劇意識〉、〈浪漫的傾向與古典的依歸——論聞一多的詩學嬗變〉、〈留日生春柳派與近代上海的脆弱情緣〉等。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三期 2004年2月28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三期（2004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